

方克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个春秋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弟子学眼前,他的学术见解和文化思想依旧是学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他的毕生藏书现在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书库中供师生借阅。2023年4月,在多方的努力下,七卷本的《方克立论著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余生也晚,第一次见到方先生是在2001年南开大学春季博士答辩会上,其时我还是一名大本科生。当时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精神矍铄,讲话声调不高,但特别有深度。我真正和方先生有接触是在读博期间。2007年,我参加了南开大学主办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的会务工作,会后根据录音整理了方先生的发言稿《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离校工作之后,我与先生多有邮件往来,后来还经常去北京先生家拜访。2019年在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协助先生编著了他生前最后一本文集《新世纪的文化思考》。先生在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指导博士生一直到2011年,此后依然非常关心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去世之前还专门给我布置了藏书捐赠事宜。

我不是方先生的亲炙弟子,对先生的家学仅有耳闻,后来获赠先生兄妹合编的《高风亮节》一书,才对其父母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方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先生(1902—1970)。老方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后赴日本、法国深造;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南图书馆馆长、湖北省文化局局长、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研究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著有《中国史学概要》《中国史学史》《宋元经济史稿》等著作。20世纪60年代参与考古发掘江陵望山沙家楚墓,考证了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铭文。

方克立先生是方壮猷先生的第三子,193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十四都青山桥乡思古堂。他在武汉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尽管家学条件优越,但父亲却并不希望其子继父业,而是鼓励他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真正让方先生与哲学结缘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1956年高中毕业时,他本来准备报考理工科大学,但有一天班主任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学校已决定推荐他报考哲学专业。于是他便赶紧复习了几天就上了考场,结果在统考前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被告知不得再参加统考,他便在此机缘之下开始了以哲学为业的学术生涯。先生晚年自述,由于父亲过早辞世,他直接继承的学术资源并不多,主要是无形中受到父亲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影响:一是重视史料,言必有据,不空论;二是重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他们微笑的样子》: 两兄弟的成长和转换

刘燕凌

1998年的第55届威尼斯电影节精彩纷呈,在最高奖项金狮奖的竞赛池中,优秀作品比比皆是,如法国影片《秋天的故事》、塞尔维亚影片《黑猫白猫》、德国影片《罗拉快跑》等等。出人意料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剧情片《他们微笑的样子》最终击败上述对手,脱颖而出,荣获当年电影节金狮奖及最佳摄影奖。

《他们微笑的样子》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58年到1964年的意大利。这一时期“意大利经济奇迹”令人瞩目,意大利工业总产值增长创下最快纪录。但繁荣表象下自有隐忧,当时意大利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而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几乎没有变化,这让南北分化问题日益严峻。由于缺乏收入和工作机会,意大利南部农民大量涌入北部城市。世世代代不曾离开农村、不识字、只会说方言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城市中,背井离乡的失落感和对社会环境的失望感,与消费文化下的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影片讲述了一对意大利兄弟从贫穷的南方西西里岛北上到灵阔天下的故事,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也是整个意大利社会底层人民的缩影。

本片导演吉安尼·阿梅利奥1945年1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坦扎罗。阿梅利奥的父亲在他15岁那年,抛弃妻子去了阿根廷,从小缺失父爱影响了阿梅利奥后来的电影创作。母亲和妹妹又不幸早逝,阿梅利奥不得不和外婆相依为命。后来他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大学攻读哲学学位,很快对电影产生兴趣并移居罗马,从助理导演开始一步步接近了自己的电影梦想。

1982年,阿梅利奥执导了电影《致命一击》,这部让他一举成名的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父子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一次袭击案件中升级。在他的电影中,总是充斥着亦父亦友的人物关系。在《他们微笑的样子》中,扮演哥哥的意大利演员洛维索,可以说是阿梅利奥一手挖掘提携的。包括本片在内,两人已经三次合作。阿梅利奥曾这样评价洛维索,说他无论是扮演警察还是投机分子,都可以精准拿捏人物的特点。影片中不仅有兄弟之间互相呵护的爱,也有导演对自己家乡的爱。就让我们踏上关于爱的道路,一起去看《他们微笑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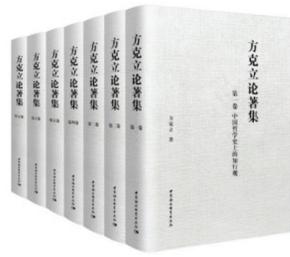
1月20日 22:23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他们微笑的样子》,1月21日 15:01“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平实为学 引领潮流

——方克立先生侧记

卢兴



《方克立论著集》(全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专业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入学后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扎实的理论功底。1959至1960学年,他因病休学在家,读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学著作,受到很大启发。接着他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初读了一遍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哲学之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此后,方先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逐渐转到中国哲学史方面,而且终生都受到郭沫若、侯外庐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影响。

1962年10月,方先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系教研室任教,主要任务就是给石峻先生做助教。1963至1964学年,石公给该校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开中国哲学通史课,方先生等人在课后给学生做辅导,同时随堂听课,跟石公又系统学了一遍中国哲学史,弥补了大学期间的遗憾。方先生认真汲取前辈大家的学术养分,进一步增强了古典文献阅读能力和哲学理论分析能力,为日后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方先生于1973年1月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任助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来。方先生在开展中国哲学史教学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教研室分配的科研选题《实践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他的研究成果后来经反复修改,形成《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当此时,中国哲学史学界出现了一股“范畴研究”的热潮,方先生的这本书因此也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有“报春花”之誉。基于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他成为学术界颇有名气的中青年专家,职称晋升也很顺利,1979年晋升为讲师,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三年后被教育部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当年全国哲学界只有5人)。1986年,48岁的方先生当选为第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1986年3月,方先生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作了题为《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已经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有了清晰的梳理,并明确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同年11月,方先生和中山大

学李锦全先生共同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确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后来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他们领导一个由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课题组,进行了颇为活跃而又十分扎实的研究工作,在10年间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包括《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共计三十余册。

在国家课题的带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现代新儒学”一直居于学术研究的“显学”位置,在这一研究中,许多中青年学者也脱颖而出。可以说,方先生所开启的这项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培养了一批学术新人。作为这项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方先生对于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得失评价、研究方法和目标等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许多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的论述。同时,他还注重总结反思这项研究中出现过的各种倾向,及时予以立场鲜明的回应,力图使这一研究沿着正确方向深入下去。

1994年2月,方先生赴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时依然受聘为南开大学哲学系兼职博士生导师,继续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直到2011年。在处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方先生依然保持着思想家的敏锐和学者的勤勉,发表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将对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

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哲学史学界得到公认,1999年他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2004年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其后受聘为第七届、第八届中国哲学

霜花

武宝生



二姐第二天捎到山下,投交给地区小报副刊。不久后的一个清晨,二姐风尘仆仆地上山送报送信,大老远就对我喊了起来:“宝娃,宝娃,你快来看,你写的文章登报啦!”

我迅速接过地区小报,打开副刊版一看,《霜响如歌》果真见报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散文。

二姐只上了不到两年的小学,识字不多,让我给她念念,她要听听文章里都写了啥。我说:“写的就是那天夜里咱们全家围着炭火,一边烤火,一边唠嗑,一边听瓦楞缝里结霜的声音。”

二姐觉得很神奇:“结霜的声音也能写成文章?”

“对,这是一篇小散文。” “散文?”二姐又好奇地问,“啥叫散文呀?” 一时,我真不知道如何给二姐解释,只好

史学会名誉会长。

总体而言,方克立先生的思想创获与学术贡献,对近40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与前辈学者一起率先倡导中国哲学范畴和范畴史研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教材编写。他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的主持人,把握引导课题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界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三大思潮”既对立又互动的格局,这一研究框架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他较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中国哲学文化优良传统之间的“两个相结合”,总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成就,并自觉承袭这一学术传统予以创造性的推进。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展开前瞻性思考,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关注、支持和倡导湘学研究、中医哲学研究、船山哲学研究、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研究、冯契思想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多有前瞻性、指导性的研究成果问世。

方先生曾将自己一生治学做人的特点概括为“平实”二字,这也是其性格和文风的真实写照。这种“平实”精神就是先生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方克立(1938—2020),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生前出版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新世纪的文化思考》等专著,主编有《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哲学与史学论丛”“20世纪中国学术论丛”“哲学卷”等丛书,《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论索引》等工具书,以及《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等多部国家级教材。

这样回答:“结霜的声音就是散文。”

二姐眨巴几下眼睛,摇摇头,还是不明白。此时二姐短发上挂着的霜花亮晶晶,光莹莹,烁烁闪耀。霜花衬托着她红红的脸颊,要多美有多美。

“二姐,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有答案了:散文就是二姐头发上挂着的霜花。” “我头发上的霜花也是散文?”

“对,是一篇好散文!”我接着说,“二姐,你这么多年坚持为小学和山民送报送信,无论风霜雨雪不间断,这就是写出来,该是一篇多么动人的散文啊!”

二姐的脸更红了:“这算啥呀?信和报加起来也没有半斤八两重,一点也不费力气。本来嘛,这就是一件捎带脚的事儿。那些年下山取信取报,可以顺便买些东西回山村。现在送报送信上山,还可以回家来看看咱咱爹娘儿们。”说着,她用手摸摸短发,碎碎的霜粒簌簌落地。

晨光熹微中的二姐,犹如一幅动人的水彩画。在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的霜花映衬下,她静静地伫立着,背景是西山多彩的橡树林,鸟儿欢唱晨曲,春在树根下悸动。

霜是碎碎的冰晶,有凛凛的轻寒,有烁烁的亮丽,有簌簌的脆响。感谢二姐又为我提供了写了一篇好散文的丰富素材。 题图摄影:刘明辉

古往今来有太多读诗迂腐的例子,这在诗论中不胜枚举。至于现世的人越读诗越陈旧狭隘,越写诗越孤僻乖戾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晚清民国时期词人蔡嵩云在《乐府指迷笺释》里曾对诗词中使用替代字的问题发出感叹:“谓词必须用替代字,固失之拘,谓词必不可用替代字,亦未免失之迂矣。”他认为有的论者一味追求替代字,显得太拘泥,一味否定替代字,又显得太过迂腐,于是对这两个极端各下了一个针砭的批语。事实上,读诗论诗显得笨,又何必在意替代字这一个问题上呢?拘泥和迂腐是笨表现出来的两面,却未必都是一定怎样、一定不能怎样的极端,也有流于太浅或求之过深的偏颇,等等。

篇幅所限,无法对种种笨读诗的现象详加类析,仅举最浅近的例子成为趣谈,庶几可作为初学者的借鉴。宋人林逋《梅花》诗云:“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胡雏即指胡人。有学者认为该诗末尾引到胡人身上,有可商之处,因为胡人吹角,当有《梅花落》曲调,那么,假如诗意原本是要写梅花凋落,这样表述自无可,但这首诗前文所谓“雪后园林才半树”云云,乃是写梅花开放,再写胡人吹角咏叹梅花凋落就显得不协调。这样的议论不显得太刻板了吗?无论说胡人吹角咏赞梅花一定是《梅花落》,还是说吹了《梅花落》就必须对应现实中的“梅花落”而不能是“梅花开”,都是胶柱鼓瑟之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林逋另有一首《梅花》诗句云:“小园烟景正凄迷,阵阵寒香压麝脐。”是说梅花寒香压过了麝香,于是有学者又提出质疑:麝香浓烈,怎么能被梅花的暗香压倒呢?这问题提得太过执着,原句说暗香压过麝香,看似夸张,然而诗人偏偏认为此暗香能胜彼浓香,又有何不可?这个“压”字大概不是气味大的意思,而是“超过”“胜过”的意思。人们对于香气的喜爱,也不是以气味的浓淡大小为主要标准的。说胡人吹梅花曲就必须咏叹梅花的凋落,是不是近似于蔡嵩云所说的“拘”而说寒梅的暗香必定不能压过麝香的浓烈,是不是又近似于他所说的“迂”呢?

再如朱熹的名作《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朦朦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两首诗都用象征的手法阐明读书的道理,而且每首诗的道理都不是单一的。两首诗的侧重点都不仅是“书”,更是“观”“感”,相同点是都用了“水”这个重要的意象作为说理的载体。而这个“水”是动态的,是为了体现读书方法而出现的,不是直接等同于静态的“书”的。

问题就在这个“水”上,“半亩方塘一鉴开”,有学者说,朱熹是把书比喻成水塘,又把水塘比喻成镜子,这乍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想想便能领悟,朱熹笔下的方塘活水,不是书本身,而是读书的方法,以及读书得法所能获得的成绩。说方塘和书之间是简单的比喻,其实是把原诗简单化了,但这姑且也无伤大雅;可笑的是,有学者又说,这个比喻严丝合缝,因为书是长方形的,所以称为“半亩”,也就是正方形的一半儿,把它打开摊在那里,就不是一半儿了,是方的,正像一面镜子。这真是僵化地解形象感的绝好案例。看来,半亩方塘不是“方”的,而是“方”的一半儿,只有长方形且面积正好是0.5亩的池塘才能称为“半亩方”;那试问正方形且面积为0.5亩的水塘又如何称谓呢?况且,按照这样的逻辑,只有长方形的书才符合朱熹“半亩”的要求,那今天的异形书离古人的要求恐怕也就太远了。这是蔡嵩云所谓的“拘”还是“迂”呢?

以这些浅近的例子来说,读诗拘和迂来得并不艰难和遥远,也正因此才要避免诗的笨读。

读诗散札(十八) 魏暑假

我上高中的时候,二姐嫁到山下的口子村。我们村距口子村8里路。山路崎岖难行,邮政车都无法进村。

未出嫁时,二姐常到口子村义务为山村小学和山民们送报送信,口子村武姓人居多,二姐基本上都认识。出嫁后她依然坚持送报送信,大伙儿亲切地称呼她“山村信使”。

那天,二姐送报送信回我们村后,突然下起了大雪。大雪封山,二姐无法下山,便住了下来。夜深人静,全家人围着炭火唠嗑。有一瞬间,我清晰地听见屋顶上传来窸窣窣窣的声响,就对身旁的二姐说:“雪越下越大,你就在家多住几天吧!”

二姐听了听,马上说:“不是下雪。” “你听听,多像下雪的声音呀!” “是瓦楞缝里结霜哩!” “结霜?结霜也会响?” “会的,会的。”二姐说,“屋顶上的热气在瓦楞缝里结霜时,就会发出脆生生的铮铮响声。”

我凝神静听,终于听到了瓦楞缝里结霜的声响,好像细微清脆的打击乐,禁不住欣喜地说:“霜响的声音真好听!”

二姐点点头。 当天夜里,我写了一篇小散文《霜响如歌》,让

先农公司与先农大院

高潮



先农大院始建于1925年,坐落于近代天津英租界的威灵顿道与达克拉道交口(今和平区河北路与洛阳道交口),由建筑围合形成建筑群。成立于1901年的先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英籍工程师雷德设计了先农大院,在当时该大院多为先农地产公司的高级职员居住。

说到先农大院,必须先提先农公司。天津英商地产公司是外商在近代天津进行土地和房地产开发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先农地产公司。主要创始人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 1857—1930)在创办该公司之前,就已经在天津法租界内购买了大大小小二十余块地皮。有学者研究认为先农公司的前身是嘉立堂。丁家立1882年来中国传教,1886年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教师,给李家子孙教授英文,彼时丁家立就以“嘉立堂”的名义开始买卖地产。

1900年庚子之乱后,八国联军为协调列强在华既得利益,成立了“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即都统衙门,作为当时的实际掌权部门,都统衙门控制管理天津的各项事宜,这也为租界内的土地流转开发创造了条件。都统衙门的成员多为八国联军军官,这些人位居高位,利用权力进行商业活动,包括涉足房地产业。在都统衙门颁布的《天津城行政条例》中就有一条“委员会有权根据需要支配军事警署”以外的政府所属财产和不动产,并且有权出售被没收的当地人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先农公司主要发起人中,丁家立、田夏礼、德瑞克等人都曾在都统衙门中任职。由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包括先农

公司在内的一些外资公司堂而皇之地开始大规模攫取中国的土地资源。1901年3月22日,七名合伙人即丁家立、狄更生、胡佛、林德、田夏礼、克森士和德瑞克,以各自手中的土地入股发起成立“先农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在当时法租界的高林洋行内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正式宣布公司资本额为105000两白银。这些股东中最为大家熟悉的胡佛,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胡佛在中国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才能支持他后来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先农公司的股东除了参加会议的7名洋人,还有一些在津的中国著名人士,如李鸿章、蔡绍基等人,这些人手中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对于公司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庚子事变后,由于时局动荡的影响,加上都统衙门为修筑道路强拆老城厢,大量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居住,出现华洋混居状况,住宅需求日益增长。先农公司开发的地产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供外国人居住的房屋,如先农大院、额尔金大楼、花园大楼;一种是供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如恒华里、南华里、光华里;另外一种则是华洋混居的房屋,如先农里、达文里等。除这三类房产之外,还有疙瘩楼、三盛里、松寿里和荣华里等。先农公司建造的建筑中被冠名“先农”的有三处:今洛阳道上的先农大院,今开封道上的先农里和达文路上的先农大楼。1902年,先农公司首先在小白楼一带建起先农里,是公司里雷德设计的先农大院落成,供公司职工主要是洋人居住。

先农大院北至洛阳道,南至燕安里,西至湖南路,东至河北路,占地4188平方米,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这里的建筑均为砖混结构,用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材料,设计风格受到当时欧洲建筑审美的影响,造型上体现了英式联排住宅和独立住宅的特点。先农公司先拆除了原来的平房,采用外联排内里弄的组织方式,整体建筑组团由英式联排住宅、英式独立住宅等六幢建筑组成。住宅建筑外部沿道路走向建造,利用联排式的沿街设计,形成街墙的完整性,达到视觉上的和谐感,也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在大院内部采用传统的里弄式住宅布局,每户都有前后院,营造出舒适美好的传统空间。部分建筑室内地面铺设大量的木龙骨、木地板和木楼梯,砖砌室内部分分隔墙。临街的两幢独立式联排住宅为二层楼带地下室,甬路用沥青铺设。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满庭芳

第五二一九期

先农大院北至洛阳道,南至燕安里,西至湖南路,东至河北路,占地4188平方米,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这里的建筑均为砖混结构,用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材料,设计风格受到当时欧洲建筑审美的影响,造型上体现了英式联排住宅和独立住宅的特点。先农公司先拆除了原来的平房,采用外联排内里弄的组织方式,整体建筑组团由英式联排住宅、英式独立住宅等六幢建筑组成。住宅建筑外部沿道路走向建造,利用联排式的沿街设计,形成街墙的完整性,达到视觉上的和谐感,也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在大院内部采用传统的里弄式住宅布局,每户都有前后院,营造出舒适美好的传统空间。部分建筑室内地面铺设大量的木龙骨、木地板和木楼梯,砖砌室内部分分隔墙。临街的两幢独立式联排住宅为二层楼带地下室,甬路用沥青铺设。

2013年10月13日,历经7年的整理和修缮后,五大道先农商展一期项目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为集餐饮娱乐、时尚购物、文博展览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文旅社区,也成为天津旅游网红打卡地之一。先农大院是天津近代以来城市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中作为外来文化进入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包括先农大院在内的城市建筑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价值,理应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修缮,并赋予其符合当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功能,融入时代发展,为当代生活助力。

《小楼春秋》解说词:

整修前先农大院由130户居民和5个单位共同使用,院落里面都是一些居民的违章建筑和企业的材料厂。历时7年,这片占地4188平方米、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的建筑群被修缮一新,还根据现代使用功能增设采暖、空调系统,并增强了建筑的自我防护功能,整体提升了楼宇的消防安全系统。(节选,有改动)